



见证沧桑巨变：一个五世同堂家族的百年

新华社太原6月29日电(记者吕梦琦) 1933年冬,她骑着毛驴,身穿红棉袄,跟着比自己大十几岁的丈夫,来到山西临县天池沟村一孔位于半山腰的土窑洞。

她叫李成英,生于1920年,出嫁时年仅13岁。

李成英的童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,5岁就被迫缠足。“裹脚太疼了,刚开始连路也不敢走。”李成英是裹小脚的坚定反对者,因为拒绝裹脚,小时候没少挨打。

这种陋习曾让中国女性饱受摧残,在广大农村,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根除。

李成英身上至今遗留着裹小脚的痕迹。她的双脚脚骨已经完全变形,尽管早已放足,却再也无法恢复。

当年,她迈着小脚入洞房,但自己的丈夫并不喜欢,因为他们是贫农,没有自己的土地,主要靠给地主打长工为生,但“三寸金莲”会大大影响干活效率。

101岁的李成英说,因为脚小走不稳路,在地主家打长工主要是靠丈夫,挣不了太多工钱。

正因如此,他们一共生了9个孩子,却只养活了6个。提起这些往事,老人闭上了眼睛,久久才说:“还是共产党好。”

地处黄河岸边的临县,在1940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。从那时起,李成英一家的命运开始不断发生改变。

1942年,临县实行“减租减息”。李成英在不远处的曜头村分到了1孔石窑,从此一家人搬下了大山。

4年后,临县试点土地改革,她和丈夫薛世堂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。《临县志》记载,当时临县将211421亩土地重新分配,无地少地农民都分到了土地。

有了土地,农民真正当家做主。靠分到的几亩薄田,李成英养大了6个孩子。

出生于1951年的薛俊喜是李成英的二儿子。比起哥哥和姐姐,他幸运地出生在新中国,不但摆脱了给地主打长工的日子,还上了小学和初中。

对于这个家族来说,接受教育是一个新的开始。

初中毕业后,薛俊喜在村里当了3年会计。1972年,他用全家攒的120元钱当彩礼,娶上了媳妇。

“那时候,农村还很穷,120元钱是我们全家好几年才攒下的。”薛俊喜说,由于盖不起新房,他和妻子在别人的窑洞里整整租住了20年。

1978年,薛俊喜的生活迎来了转机。

从这一年起,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。各种新办企业快速涌现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农村快速推开。薛俊喜不仅承包了土地,更有了外出打工挣钱的机会。

4年后,他建了两口窑洞,搬进新房。但



山西临县一百零一岁老人李成英(6月8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吕梦琦摄

贫穷仍如影随形,直到前几年才彻底改变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指导思想。薛俊喜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得到了精准帮扶,终于在2018年脱了贫。

“去年,我的收入超过1万元。”他说。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,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%。

夏日的曜头村一片生机,崭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错落有致,400多座大棚整齐排列在村边。李成英的第三代长孙薛兴平,放弃在外打工,重新回到了村里。他流转了

20亩耕地种玉米,一年能挣2万多元钱。

“村里在搞乡村振兴,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多。”他说。

薛兴平今年54岁。他拒绝像父辈那样把自己一辈子拴在土地上,一成年就外出闯荡,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。

他在煤矿挖过煤,在大城市当过修理工,早在1990年就花十几万元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。

但他的儿子薛勇则更向往城市。

这位1996年出生的年轻人是省城太原的一名网约车司机。“我现在每天收入在350元左右,挺不错的。”薛勇说。

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。薛勇和妻子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,每过几周,就会开3小时车回老家和父母团聚。

去年,他带着一岁半的儿子,参加了祖母李成英的百岁生日宴。这个大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五代,在一片祥和实现了第一次见面。

李成英一生艰辛,不识一字。但她最小的后代薛子皓,将在城里上学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,占63.89%。

这就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故事,跨越百年,透视出中国从苦难到兴盛的沧桑巨变。

家史与党史

西藏自治区仲巴县,平均海拔5000多米,进入6月,高原依旧寒风萧萧。

以旷野为教室,以亲历为教材。在西藏扎东特委旧址前,71岁的老党员边琼坐在寒风里,滔滔讲述着党史国史和西藏解放史,也沉浸在自己的翻身经历和奋斗经历中……“牧区的条件简陋,宣讲常常是席地而坐。”他说。

进机关、走村镇、入学校,以这种方式进行宣讲,边琼老人已坚持了7年多。

“我是1973年入党的老党员,新时代要当好党的政策的宣讲员。”边琼说。

2014年,边琼踊跃报名,成为“老仲巴宣讲团”的一名宣讲员,在全县开展党史等教育宣讲活动。如今,他在宣讲中已走遍仲巴县13个乡镇58个行政村。

一个手提包、一辆摩托车、一个装满荣誉证书的铁箱子,就是他的全部工具。“宣讲的主要内容还是在这里。”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,还提起了一段辛酸家史。

“是党给了我新生!”边琼说。

边琼从出生就背着农奴的身份,直到9岁时这一噩梦才结束。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,他们全家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生活,干活稍有懈怠就会遭到领主的鞭打……

儿时的记忆让边琼终生难忘。现在每次宣讲时,他都会讲述这段真实遭遇。

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,边琼一家分到了牛羊等生产资料,日子逐渐好转起来。重获新生的边琼,后来报名参军,并于1973年在所属连队入党,在边境前沿保家卫国。

10年军旅生涯里,边琼还跟着战友认识了汉字、学会了汉语,之后退伍转业到了银行,勤勤恳恳工作至退休。

如今虽然已退休近20年,但边琼闲不下来,经常购买党史教材和其他书籍,并把内容讲给老百姓听。近来,他又及时学习疫情防控知识,骑着摩托车入户讲解。

“别看我70多岁了,组织需要我到哪

翻身农奴边琼的人生新坐标

边琼在仲巴县扎东文化广场给该县文化系统干部职工讲授党史课(5月16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

里,我就到哪里,一切听党指挥。”他指着胸前的党徽说,“我是一名党员,宣誓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。”

“部队生活让我认识到守土固边的重要性。”边琼说,后来当地村民自发组建了摩托车联防队,退休后的他以队长的身份带领村民到边境一线巡逻,每年巡逻40多次。

一趟巡逻下来就是150多公里。10多年里,边琼巡边行程超过10万公里,先后骑坏了6辆自家的摩托车。“当时巡逻路况也不好,飞沙走石的,我们就随身带些糌粑、方



便面,沿途取冰雪煮水喝。遇到大雪封山,就和队员们抱团取暖,坚持熬过去。”他回忆道。党的光辉照边疆,边疆人民心向党。

作为一个高海拔牧业县,仲巴有着丰富的草场资源,当地老百姓世代以放牧为生,随水草而居。

民主改革后,村民为提高收入、改善生活,不断扩大牲畜养殖规模,当地生态一度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
为了保护生态环境,边琼一方面呼吁种草,另一方面带头减少牲畜数量,目前他家的

牛减少至90头,羊仅保留了13只。“如果大家争相扩大养殖规模,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变成黄沙漫天。”这是他宣讲时常说的内容。

减畜过程中,收入一度减少,为此,边琼努力做家人的思想工作,他在家庭会议上说,现在国家惠民政策这么好,家里每年享受草场补贴、边民补贴,我还每年享受60岁以上老人补贴,我们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。

在边境小康村项目建设的藏式房屋

里,边琼一家人围着火炉聊着家常,笑声不时传来……自从退休后,边琼先后搬过4次家。他说,新房子让他感到了温暖。

“房子是国家免费盖的,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。作为边民,我们要安安心心守好边境。作为党的政策的受益人,我要把党史好好讲下去!”边琼说。

正午时分,高原的阳光变得炙热,边琼黑色大衣上的党徽,更加熠熠生辉。

记者:沈虹冰、张京品、李健、陈尚才、柳新勇

是什么力量,让古稀老人一人盖起三座房

1948年秋,我的家乡——河南省新乡县八柳树村得到解放。自此,我家逐步摆脱贫困、苦难和欺凌,走上了幸福、美满、富庶的康庄大道。

八柳树村有四五千人口,当时国民政府在此设有镇政府,下设100余人的“自卫团”,横征暴敛、欺压百姓。解放军来了,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家伙树倒猢猻散,狼狽不堪。

乡亲们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,夜宿街头秋毫不犯,心中无比高兴,都说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不久,在新的乡政府帮助支持下,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,又成立了党支部,进行土地改革。我家、叔叔家还有四个姑姑家,在土改中都分到了土地。大家欢天喜地,集中精力种好自己的田地。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,生活逐步好转起来。

为了更好地种田,在政府的支持下,我村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。农民们义务劳动,挖了数道水渠,引来黄河水;又打了数口

深井,抽取地下水。这样,天旱了可以调水灌溉,涝了可以从水渠中排水,广大农田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。

那时,我30多岁的父亲已是种田好手,有了这么好的条件,加上自己精耕细作、精心管理,我家的粮棉收成大幅提高,小麦最好的收成每亩能达到七八百斤;棉花也由原来的每亩30来斤皮棉,提高到100余斤。

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工业、农业、科技快速发展,铁路、公路处处修建,原子弹、氢弹相继爆炸成功,导弹腾空,卫星上天。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,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农也是极大的鼓舞。他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求学,增长知识,投入祖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。

我在兄弟姐妹中,首先考入了铁路技校,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铁路工人,不久又当上了一名机关干部,并逐步走向领导岗位。我的

经历对我的子女、外甥等下一代具有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。

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,到1995年的十余年间,我的子女和我弟弟、妹妹的子女共16人,通过刻苦学习,渐次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、郑州大学等高校,有的还上了博士。他们入团、入党,学业有成,爱岗敬业,生活幸福。一个大家庭的孩子们都能至少大专毕业,并找到满意的工作,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。

1978年,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我家种的小麦大丰收,收获了3000余斤,比起旧社会一年仅能收获400斤左右粮食,可谓天壤之别,年迈的父母喜出望外。

这时年近70的父亲,看到粮食多了,条件好了,决心要改善家庭住房条件。他年轻时曾做过泥瓦匠,不知给别人盖了多少楼堂馆所,但由于经济困难,直到渐近古稀,仍然住

着自己盖的“干打垒”房子。

老父亲决心要盖砖瓦结构的房屋,并且给4个孙子一人一套。搬砖、和泥、垒墙、挂瓦,父亲一人独干,只有上梁、架水泥板时才请人帮忙。将近10年的奋战,他一人盖成1座5间平房、2座2层楼房,加上翻修好的老房,正好一个孙子一座。

一个老人盖了3座房的消息传遍了附近各个乡村。这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有如此干劲?这是改革开放的力量。改革开放调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,我家这位老人也“不甘示弱”,完成了多年来的夙愿。

如今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,我家也有了更独立、更优秀的下一代,个个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、研究生,有的已经进入国家机关任职。相信依托祖国的发

展,他们的前途会更光明、更远大。

回想建党百年,我这个原本贫穷的农村家庭,被时代之手一步步推向幸福美满,已是耄耋老人的我,心中非常高兴满足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没有改革开放,也就没有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85岁时,我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,写下一首小诗,抒怀:

我的年纪八十五,吃喝不愁有房住;
出门汽车送又接,养老金有五千五。
锻炼身体闻鸡舞,结伴钓鱼到远湖;
手足灵便头脑清,耳聪目明牙口舒。
练习书法与诗赋,书报文章天天读;
能辨大事是与非,与时俱进不糊涂。
儿孙个个孝敬吾,家庭和谐乐呼呼;
感谢伟大共产党,贫穷已换全家福。

(口述:王长业 郑州铁路局退休干部)